

略论吴于廑先生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齐世荣

吴于廑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贯通中西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西方史学史、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等。但我认为,吴先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在世界通史方面,他作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是当之无愧的。

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吴先生对于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即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所走过的道路。1949年以前,我国各大学历史系设课,主要是西洋史和东洋史,只有个别学校有世界史。大多数学校开设的是西洋通史和欧美国家的国别史,如英国史、美国史等等。少数学校的历史教师开设过亚洲史,如燕京大学的翁独健先生;或日本史,如清华大学的周一良先生。似乎没有一所学校开设过非洲、拉丁美洲的区域史或国别史。在任何一个历史系中,外国史课程的门数都远远少于中国史,专教外国史的教师更是寥寥无几。总之,1949年以前,在各大学的历史系中,中国史是“大国”,中国古代史则是“超级大国”,而外国史不过是“附庸”而已。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许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上不占重要地位,因而那时各大学的主持者也就不可能有胸怀全球的抱负,从而把世界史提到应有的高度。即使作为个人具有这样的抱负,也是无济于事,不能影响全局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由于学习苏联大中学校的课程建设,才有了世界史。而苏联之所以重视世界史,根本原因在于它当年是有很重大政治抱负的。1949年以后,各大学纷纷开设了世界通史(通常分做四大段: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以及一些区域史和国别史的课程。国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所,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研究所、美国所、日本所、南亚所、苏联东欧所,等等。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研究世界历史的研究所或研究室,武汉大学的世界史研究所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个。少数大学的历史系还设立了世界史专业,与中国史专业并列。根据以上概略所述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所走过的道路,1949年以前的阶段似可称做它的史前期,或萌芽时期;1949年迄今的阶段,似可称做它的奠定基础的时期。吴先生的学术生涯开始于第一时期,成熟于第二时期。

在第一时期,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旧中国无力购买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即使第二手的权威著作也买得很少(个别学校多一些,如清华、燕京、北大),因而当时外国史学科的成就主要在于教学,而不在于研究。有些学者在国外本来是专门研究外国历史的,回国后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史(如雷海宗先生、齐思和先生),外国史方面则只是开课,“述而不作”。有些学者一生坚守外国史的教学岗位,他们的西洋史修养很深,但由于老先生们治学严谨,所悬标准很

高,不愿在缺乏第一手史料的情况下轻易下笔,因而一生只留下过很少的外国史论著(如清华大学的刘崇铨先生)。虽然如此,先驱者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是这一代人,把外国史这门学科引进了中国,并培养了许多学生。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世界史学科在第二时期的建立,就会困难得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一代学者功底深厚,中西兼通,他们所介绍的都是当时西方史学的最新最高成就,因而他们的继承者也就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建设我国的世界史学科。

如上所述,1949年以后,世界史学科在我国开始建立起来。最初是引进苏联学者的成果,实质是学习他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世界历史。成绩不少,但也有缺点,就是过分相信苏联学者的论述,颇有点“言必称苏联史学”的味道。1959年中苏关系在政治上破裂,但在世界史这块学术领域上,从体系到一些具体观点,我们仍然深受苏联的影响。只是在1976年以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才走上了独立研究、健康发展的道路。从1976年到今天,不过十六七年,但在这段期间,世界史这一学科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①。成绩之所以取得,主要原因有四条。第一,有了比以前更民主的政治环境,学者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不致遭到批判,甚至受到比批判更为严重的处理。第二,由于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我国的学者走出去,外国的学者请进来,世界史学科从而得以广泛吸收各国的研究成果,而不像过去那样囿于苏联一国的影响。第三,资料比“文革”前大大充实。资料的质量也大胜于前,这是由于资料来源的多样化,国家购买的、个人留学讲学带回的以及外国赠送的。第四,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由于有了吴于廑先生这样一些著名学者所起的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总之,在第二时期,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已经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虽然,从总体上讲,我们的水平还不够高,但在某些方面,例如吴先生所研究的世界通史和15、16世纪史,周一良先生所研究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季羨林先生所研究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等,我国的水平是很高的,走在世界前列的。为什么吴先生这一代学者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呢?这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多种条件,主要是:(一)中西学问俱有根底,故视野广阔,能从比较中发现问题的。(二)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多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故能抓住重要问题,作深刻分析。(三)受过考据学的训练,故材料扎实可靠,立论有据。(四)中外文俱佳。既精通外语,能熟练地使用外文资料,又富有中国文学修养,故写出来的文章引人入胜,经久耐读。

现在,我要着重讲一讲吴先生对于世界通史这一学科的特殊建树。解放后,我们许多人都在教世界史,但对于世界史这一学科的认识对象,做过专门、深入研究的人并不多,起码我个人对这一问题就知之甚浅。一种理解是把中国域外的外国历史统统当做世界史;另一种理解是在讲授外国史时适当加些中国史的内容,二者加在一起就成了世界史。但这些都不是严格科学意义的世界史。吴先生正确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形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吴先生还多次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进一步指出世界史所要探索和说明的主题是:“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说:“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历史由原始的彼此闭塞的人群的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其自身是一历史过程。吴先生对于世界史学科的认识对象和主题所做的这种说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把世界史当做一门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那么它所包含的内容势必十分庞杂,难免成为一口什么都可以装进的“大麻袋”。这种界限含混

不清的“世界史”，实在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即使写出来，也一定杂乱无章，令人只见树木（而且是杂树丛生），不见森林。因此，吴先生断言：世界史“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容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还有一种流行的办法，就是按照国家的重要性来写世界史。重要性大的，多写；重要性小的，少写或根本不写。但是，重要性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共识的标准，你说你重要，我说我重要，于是各式各样的“中心论”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出来。但是如果按照吴先生所确定的世界历史的内容和主题来研究，我们就能获得一条主线，从而看清世界历史的既往进程，并判明世界历史的今后发展趋势，以便顺应历史潮流地迈步前进。

吴先生根据他上述的认识，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这一概括性很强的总条目。此外，还连续撰写了四篇相关联的重要论文，它们是《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这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鸿篇巨制，从宏观着眼，从具体分析入手，史论结合，卓然成一家之言，堪为后学的楷模。吴先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论著，以及在他指导下由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完成的一批著作，例如三本很有水平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一、二、三编。总之，吴先生作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众所公认的。我相信，按照吴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在世界史学界占一席重要地位。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进一步研究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还要研究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的交叉关系。在纵向发展方面，长期以来我们是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严格序列来论述的，但是世界历史并不是按照一种模式直线发展的，因此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奴隶社会并非全人类必经的历史阶段的说法。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应当同其他问题一样继续讨论下去。在横向发展方面，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就是一个包括许多具体问题的大题目，可做的文章很多。至于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的交叉关系，则是一个难度更大的课题。历史在纵向上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向横广发展。例如，资本主义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世界市场，不会有广泛的殖民活动。反过来，横向发展又影响纵向发展，有了广阔繁荣的世界市场，才有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才有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和那个直到今天仍令英国历史学家无限追念的维多利亚王朝。

今天，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就为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恰好是了解世界的一个有力工具。沿着吴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家所开拓的道路，我国的中青年世界史学者必能攀登科学高峰，开创世界历史学科的第三时期——大发展的时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贡献。

附记：此文原系为庆祝吴先生八十华诞而准备的一份发言稿。发言后二日，吴先生遽归道山。今已不可能再向吴先生请教，故对原稿不作修改，保持原貌，以纪念我所十分尊敬的吴于廑先生。

注 释：

- ① 参见拙文《从无到有，茁壮成长——世界史研究四十年》，载1990年《中国历史学年鉴》。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